

感受

『阿莱夫』

的光辉

张绍九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受阿莱夫的光辉 / 张绍九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5

(文学新锐丛书系列之七)

ISBN 7-5063-3552-X

I.感… II.张… III.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7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8308 号

书名:感受阿莱夫的光辉

作者:张绍九

出版:作家出版社

发行:作家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邮编:1000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金川百纳

装帧设计:李志强

责任编辑:李明宇

印刷:昭通美克印艺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1/16

印张:10 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063-3552-X/1.339

定价:30.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作家、作品与评论(代序)

作品是作家创作出来的,正如孩子是由父母带到世上一样;作品的灵魂源于作家的灵魂,也如孩子的基因来源于父母遗传。一个孩子尽管先天因素——基因源于父母,但由于后天因素的影响,可能比父母优秀,也可能比父母差。作品也如此,作品的灵魂源于作家,作品是作家的创造物,可是,由于作家文学素养、外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作品也呈多样化,很多作品所呈现的内涵还不如作家本人展现给我们的多。然而伟大的作品,却会给读者呈现作家本人也意想不到的世界,作家的伟大正在于此。作品一旦成型,脱离了作家,它就成了有自己生命的独立个体,所展示的内涵并不一定与作家真正要表达的内涵完全吻合。

我们姑且不去谈论那些为了很多目的而制造的文字垃圾,因为不是文学作品。至于那些“作品所呈现的还不如作家本人展现给我们的多”的作家,最好是去从事社会活动,因为那种场合更能体现他的才华,譬如,一个口若悬河、协调能力又非常强、而书面表达相对较差的人,较适合他的

职业应该是管理、外交，而不是写作；如果一部作品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作家的思想，这个作家也算是优秀的了；而伟大的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远远超出作家所要表达的。对于这些远远超出作家所要表达的内涵的作品，就显示出评论重要性。

一部作品不论多么伟大，也有可能被毁掉、被埋藏，或者没有被人们发现他的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就差点被他的遗嘱给毁了。

卡夫卡是一位业余作家。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许多中短篇小说和三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还有大量书信、日记、随笔、箴言等，但他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十分严格，对大多数作品不甚满意，生前只发表了极少的一部分。他在遗嘱中要求好友马克斯·布洛德烧毁他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但布洛德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将卡夫卡的所有作品整理出版，可惜很多作品在此以前已被他的女友按照他的愿望烧毁了。

布洛德是卡夫卡已发表和未发表作品的重要读者，卡夫卡的写作动力是他把写作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他在乎的是写作过程，当他有了这一过程后，他嘱咐他的朋友布洛德，在他死后把他的作品统统烧毁。可布洛德慧眼识珠，在违背好友意愿的情况下保存了卡夫卡的作品，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就是一种评论。在文学史上，布洛德这种广义定义上的评论显示了其极为重要的作用。否则，卡夫卡其人便不再为后人所知，也就不可能成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世界各国的研究者以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政治、历史的知识等为背景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意义，并以各自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作品内容而对作品作出解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出发点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同一研究方法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如此热闹的局面全赖于布洛德的不曾执行遗嘱。

文学研究没有自然科学研究那种实证性，解读作品主要在于这种读法是不是可能成立，是不是合乎逻辑。只要一种读法和作品其他内容不产

助效果，故也一并收入；笔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用力较多，文章较长，故置于最后；论文顺序按研究对象分三类，中国文学研究为一类，昭通文学研究为一类，世界文学研究为一类。其中又分别按小说置前，诗歌置中、散文置后以及论文涉及表达方式较多的在同类中置前的方式排列。

集中论文难免缺点和不足，三人行必有我师，故请各位翻阅者不吝赐教。唯一可值得安慰的是，在每一篇中，作者都力图在所阅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作出言之有据的论述，以求在文化的视野下对文学表现技巧和接受效果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抛砖引玉的推进性工作。

钱钟书先生出书时曾有一次谈论到国外常有书前注明献于某人的惯例，觉得有时候成了一种失去实质意义的套路。受此启发，本人想到书前作序也是出书的一种惯例。原想全舍去，但自序对本书情况作出说明，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导读，有其存在的必要。另外，偶然看到黄萍医生谈论作家、作品与评论关系的文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本文集结集意义的一种论证，故现成拿过来代序。为朋友之谊阅读论文在所有阅读中大约是最为劳心苦神之事，故打消了请其他师友作序的想法。读者诸君从自序和目录中大致已可判断自己有否阅读的必要，择其需者而读之，置其不需者于不顾。若能在此过程中有所共鸣，结识一二知己，便是莫大的荣幸了！

此集子的形成，颇赖朋友之力，在此深表谢意！

张绍九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自序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充满了智性的光辉和神秘不确定的气息,《阿莱夫》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在这篇小说里,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小说这样描述阿莱夫:“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我的感受里,文学作品的世界正类似于这样的阿莱夫。而在博尔赫斯的另一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里,博尔赫斯试图将无限拆分成最基本的25个字符。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常常有将作品的表达手段和策略拆分,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的欲望。而这样一个走近内涵无底的文学作品的过程,就如同走近文学“阿莱夫”,感受它表达技巧的精妙光辉。因而,我把这本集子定名为《感受“阿莱夫”的光辉》。

在这一组对中外文学作品进行剖析的论文里,我从文学作品的心理表达方式、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变化、意境生成方式以及意象设置手法等多个侧面结合文化生成因由进行了文学表达方式的研究和探讨。作品表达方式及所引起的效果是本文集的结果主题,多数论文较为集中地对此进行了研究。要说明的是,有少数几篇只是对作品进行思想文化视野下的观照时对作品表达有附带涉及,也对主题研究有所裨益,故收入;另有几篇不在此主题下,但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禅宗论道式旁敲侧击的帮

生矛盾,它在诠释学上就应该是合理的,也就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解读,一种可能的解读并不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导致这些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文学作品的形象性和描述性的特征。

《城堡》所呈现给人们的世界,远远超过了卡夫卡自己真正希望描绘的那个世界,这展示了卡夫卡的文学天才,也是作品伟大的原因之一,而《城堡》的伟大,又体现了卡夫卡的伟大。伟大的作家,离不开伟大作品的支撑。而作品和作家成其伟大之名,又依赖评论的发现。

作家的创作常常与潜意识活动和灵感现象密切相关。作品的生成会出现非作家显意识所能控制的状况。我们在作品、作家和评论之间的关系方面,就还能举出另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别林斯基和果戈理。果戈理的《死魂灵》在发表后,得到了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并为其建议了此后创作的发展路向。可是果戈理自己并未认识到别林斯基所谈论到的那种优点,于是他因固执己见,加之社会其它方面的压力,他从另外的方向去开拓发展而没有采纳别林斯基的建议,终于导致了作家创作不顺畅,最终因不满意作品而自焚其稿的心痛结果。

一部《城堡》被布洛德、文学批评家、社会公众发现了他的价值。《死魂灵》被别林斯基发现了它的伟大价值和潜能路向。现存伟大的作品也被人们发现了它的伟大。可能还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伟大作品正等待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去发现。这个世界需要千里马,也需要伯乐。文学批评家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发现了作品的伟大。发现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才华和智慧体现。

作品需要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诠释,作品伟大的声名正是人们(特别是文学批评家)诠释的结果,当然前提是作品确实伟大。

黄 萍

目 录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时代情绪的迸发/1
- 历史深处沉重的回音/8
-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音乐性再释/15
- 试析《边城》的悲剧性意蕴生成机制/25
- 《白色鸟》与《文鸟》对比研究/30
- 传统情爱观和女性角色观的解构/37
- 黑暗与光明交织的记忆/42
- 清音出天然/48
- 一剂清凉的针药/53

昭通文学研究

- 直面人性状态/56
-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65
- “集体施虐情结”的深刻展示/70

- 劣境扭曲人生的真切演绎/77
- 面向光明的沉重/84
- 灵泉浇灌的花朵/95
- 梦里梦外花落多少/101
- 纯净光芒照大地/111
- 星星闪烁悦人心目/118
- 晶莹剔透水晶心声/126
- 别开生面新姿扬/130

外国文学研究

- 心灵律动的变奏/136
- 灵魂沃土滋养的奇葩/145
- 小说《空中骑士》和《第四十一》比较/152
- 从女性视角再释马柳特卡形象/162
- 托尔斯泰作品的隐含作者/169
- 济慈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171
- 论禅宗对中日古典文学批评方式的影响/177
- 安娜与斯佳丽形象审美共性比较研究/183

时代情绪的迸发

——从叙述学角度再读《红高粱》

一个民族的性格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得宛如大河蜿蜒,有时惊涛裂岸,有时浊流缓波。每个时期的扛鼎之作,无不是这种精神和情绪的扭结、交织点。度过“万马齐喑”的文革十年,人们在阳光下暴露得并不算太长的习惯了黑夜的眼睛,一下子被《红高粱》那恣意汪洋的血色灼痛。于是,那些潜藏于心底的躁动、渴望、悲欢和忧喜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渲泻的出口。所以,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红高粱》既是对历史特殊境遇里高扬的原始强悍精神的追寻,又是作品生发时代起伏波动的情绪的言传。至今再读这部新时期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中的佼佼之作,仍能感受到那种激动心弦的震撼力。《红高粱》早已以其叙述形式的新颖而引人注目,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不过,关于这部作品的研究,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在叙述策略与主题呈现方面尚有值得再细说的地方,笔者在此试对整部作品再作解读。

《红高粱》的故事是一个英勇抗日的故事。日本人修路强拉骡马和伙子,罗汉大爷怒铲骡蹄,被日本人活剥皮。王文义三个孩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死,他老婆送他加入抗日队伍。余占鳌拉起杆子,到公路边伏击日本汽车。《红高粱》的故事是大敌当前,妇女展示机智的故事。戴凤莲在淫邪

的日本兵面前装疯躲过侮辱。为打日本鬼子，她喝血酒，在冷支队和余占鳌中间斡旋，并向抗日队伍献铁钯扎汽车之计。她组织村民烙饼煮粥，和王文义的妻子担挑送往战场被扫射而死。《红高粱》的故事是英雄救美的故事。戴凤莲出嫁，路遇劫匪。轿夫余占鳌率众杀死劫匪，后他又杀死戴凤莲的麻风丈夫，给戴凤莲打开一个生活的新天地。《红高粱》的故事是柔情缠绵的故事。强悍血性、百发百中的神枪手余占鳌看到疲倦的戴凤莲伸出轿外的小脚，他轻轻握住，把它送回轿内。他还为新娘子抹去轿里呕吐的污物。村里最美的姑娘玲子暗恋着训练队伍的学生兵任副官。《红高粱》的故事又是一个展示独特风俗的故事。克郎响的桐油泡过十几遍的绣花小脚鞋。出嫁的喇叭喷响和轿夫抬轿的一招一式。死人时的哭丧和披麻戴孝的礼数。总之，《红高粱》的故事本身充满了传奇性。如果按普通零聚焦叙述模式的通常的故事因果逻辑结构文本，只要加一点悬念、插叙之类就可以形成一个颇有可读性的文本。但如果仅仅这样，尽管可读性强，那也只不过是一个超越不了以往成果的普通文本。《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等，早已在这个套路上形成范本。

新时期成功的作家自然不会满足于此。《红高粱》充分发挥了零聚焦叙述模式的作用。在零聚焦叙述模式中，把聚焦方式暂时转换为外聚焦叙述是常见的“合法转换”。比如王文义被妻子送去打日本，他跟着余占鳌在打伏击的路上被哑巴不慎走火的枪打中耳朵一节：

王文义惨叫一声：“司令——我没有头啦——司令——我没有头啦——”

余司令一愣神，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
……

“大叔，”父亲说，“大叔，你挂彩了。”

“豆官，你是豆官吧，你看看大叔的头还在脖子上长着吗？”

“在，大叔，长得好好的，就是耳朵流血啦。”

王文义伸手摸耳朵，摸到一手血，一阵尖叫后，他就瘫了：“司令，我挂彩啦！我挂彩啦。”

……

余司令说：“你好大的命！”

王文义说：“我的血流光了，我不能去啦！”

余司令说：“屁，蚊子咬了一口也不过这样，忘了你那三个儿子啦吧！”

王文义垂下头，嘟嘟哝哝说：“没忘，没忘。”

这种暂时的外聚焦式转换鲜明地把人物呼唤到了读者眼前。寥寥数节对话，就把王文义的胆小怯懦，余占鳌的粗鲁强悍刻划得栩栩如生。在戴凤莲装疯，罗汉大爷铲骡蹄，戴凤莲出嫁，冷支队和余占鳌就抗日对话，冷支队和余占鳌在战场相遇等情节中，叙述者都运用了这种方式，使得文本一幕幕地出现戏剧式逼真的再现效果。

戴凤莲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独白：

“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但我不想死，……”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剖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零聚焦全知叙述者的人物内心展示还大量篇幅地存在于有关豆官、罗汉、戴凤莲的不少情节叙述中，使得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地活动在文本里。

更加独具特色的是，《红高粱》运用语言的陌生化手法，使景物和人物感觉等以奇幻新颖的方式冲击读者的接受视屏，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记忆深刻的印象。

“夜色灰葡萄，金风串河道，宝蓝色的天空深邃无边，绿色的星辰格外明亮。”“高粮爱情激荡。”“甩手一响，两只狗眼灭了；又一甩手，灭了两只狗眼。”“一棵高粮头颅落地。”“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一股紫红色的火苗，也在他空白的脑子里缓缓亮起。”“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

再加上不时出现的红高粱的海一般汪洋的血色。整个文本中的过去那个世界便透过这一系列出色的陌生化感觉描写扑面而来。而且，在鲜明

色彩的裹挟之下，一个充满质感的世界同时便带来了生命力蓬勃旺盛的气息。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出色的文本了。我们通过零聚焦叙述者的引导，在民间叙事语调的笼罩之下，看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乡野世界里一幕幕情感充沛、生机勃勃的活剧。但对于以上这些，作家还不满足。作家还要运用更多的叙事技巧拉大文本的张力，营构文本的更深刻的深层意蕴。于是，面对我们的作品最终以和普通零聚焦叙述模式大不相同的面貌呈现。作品出现创作中并不常见的零聚焦模式向第一人称内聚焦模式越界现象。

聚焦模式越界现象不时可见，但多出现在内聚焦、外聚焦模式向零聚焦全知叙述模式的越界。比如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第一人称叙述者马塞尔对贝戈特死时的心理描述就是典型的第一人称内聚焦模式向零聚焦全知叙述模式的侵权越界。而在外聚焦叙述模式范例《白象似的山丘》中，短暂出现了男主人公“他”在等火车时的内心想法，就属于短暂的外聚焦叙述模式向零聚焦叙事的越界。至于零聚焦叙述模式向内聚焦模式越界的现象，在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开头出现过。作为零聚焦模式全知叙述者的“我”声称不了解温特伯恩内心活动，就是零聚焦叙事向内聚焦叙事越界，但非常短暂。在《红高粱》里，越界非常醒目而且为整个作品烙印了一层特别的色彩，极大地扩张了作品的内涵容量，从而使作品与此前国内的战争题材小说在叙述策略和文本感染方式上拉开了距离。

在全知叙述者自由出入多个人物的内心并且作全知叙述的主体部分，作品把零聚焦模式中常见的主要人物的称号大部分陌生化为“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行动主体称呼。这种特殊的称呼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使作品此前革命历史故事中少有的任性与平易之感，增加了作品与读者的情感亲和力。与此同时，作品随时随地因此自然而然地带上“我”的影子，这些和“一九三八年古历八月初九”之类的叙述不断提醒读者所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的世界，提醒读者历史与现在的距离，使我们在感受到眼前飞扬着的一个个鲜活的面孔的同时，时时被一种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

了鼓角铮鸣般历史和过去时态气息所包裹。

作品并且在78页的总篇幅中用7页差一点的份量设置“我”这个并未参与历史事件,但却与事件参与者有血缘关系的聚焦点进行叙述。作品在开头不久,便叙述了一个男孩子在“父亲”的坟头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又叙述道:“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二”这个部分,作品叙述道:“刘罗汉大爷是我们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关于他与我奶奶之间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在最后一部分,作品叙述:“爷爷带我到高粱地里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也离着墨水河大桥不远。我猜想,那儿就是奶奶升天的地方……”按惯例,零聚焦叙述者是无所不知的,作品却一再明确说出“我”有不清楚的事,从而使聚焦暂时限制在“我”的聚焦点内,这一个悖论表明作品超出常轨造成向第一人称内聚焦模式的越界。

由于作品叙述模式的越界,我们发现作品导致了单一的零聚焦叙述部分所不能产生的效果:从作品设置的“我”的视野里所叙述的内容和语调与零聚焦全知叙事所叙述的部分造成了一种复调的效果。我们看到零聚焦叙述部分使得故事题材、人物、环境、情节呈现明晰的逻辑性,让我们很容易就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个部分以民间的态度和立场真实生动地展示了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具体细致的过程。而“我”叙述和“我”出场的部分则代表了后来的描述和看法,常常以一种夸张的语词叙述,恰与零聚焦叙述部分形成一种对话。作品叙述村里的老太太对“我”说:

“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调来铁耙摆连环,……”听起来传奇般地非常带劲。而我们从零聚焦叙述部分看到,打伏击的余司令的队伍“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四十人。”东洋鬼子的确魂儿散,不过余司令也成了光杆司令,他的队伍可以说全部覆没,还外带情人的中弹。所以“我”存在的时代场景又出现时,“一九五八年……我哥哥从钢铁堆里偷回一个钢盔,吊在炭火上烧水做饭。父亲凝视着在烟火中变幻颜色的钢盔,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伏枥老马的悲壮神色。”一九七六年,“爷爷牵着我,……他站在

桥头上,手扶着桥墩石,一站就是半个上午或半个下午。我看到爷爷的眼睛常常定在桥石那些坑坑洼洼的痕迹上。”“爷爷把枪砸成一堆碎铁,然后,一件件拿开扔掉,扔得满院子都是。”我查阅的县志记载:“农民刘罗汉,乘夜潜人,用铁锹铲伤骡蹄马腿地数,……日军在拴马桩上将刘罗汉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而从零聚焦叙述里,我们得知刘罗汉是因为骡子没认出他,不跟他走才怒铲骡蹄的。在被害时,刘罗汉求孙五一刀捅了他,但孙五不敢违日本人的命令。被割时,刘罗汉狂呼不止,“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吡出来”。后来刘罗汉才大骂不止。“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在叙述了“我奶奶”与刘罗汉不清楚的男女关系传闻后,作品接上“我深信,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叙述完“我父亲”打伏击时在河堤上抬眼就看到无垠的高粱,接着叙述“所有的高粱合成一个壮大的集体,形成一个大度的思想。——我父亲那时还小,想不到这些花言巧语,这是我想的。”

我们从上述可见,在现在时的“我”在场的越界叙述部分往往呈现一种宏大的,倾向于共性消解个性的话语。而在零聚焦叙述部分往往呈现共性寓于具体复杂的个性的情况。两相对比,复调叙述的张力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了解历史和过去。也可以隐约感受到两种时代背景下的气氛。从这里,我们大约可以理解作品在开头部分为什么特意设置“父亲”的由人评说的无字的青石墓碑。著名文学理论家米哈依尔·巴赫金认为主体分化越严重,作品越出色。我们从《红高粱》里叙事语气和内容的复调性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小说与世界文学创作的沟通。

而且,由于叙述模式越界所造成的“我”给整个作品的着色效果,作品总体就呈现一种回顾性的氛围,而不像普通零聚焦叙述模式那样让读者感受到此在存在的幻觉。于是,作品中就出现回顾性叙述中的预叙情况,比如:“我父亲……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在出村的路上,“我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唤起父亲心灵深处一种非常遥远的回忆。

……七天之后,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那股弥漫田野的腥甜味浸透了我父亲的灵魂,在以后更加激烈更加残忍的岁月里,这股腥甜味一直伴随着他。”“父亲常走这条路,后来他在日本炭窑中苦熬岁月时,跟前常常闪过这条路。”这些多次出现的回顾性叙述中的预叙所造成的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交织给作品加进了一种命运感和历史感,随时把读者从全知叙述的似真性中拔出来体味人生的沧桑。

总而言之,我们从《红高粱》里看到了讲求逼真再现性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精神的体现,同时我们又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手法注重创作的表现性的影响。这两者通过零聚焦叙述模式的运用及其向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模式的越界和一系列通感、象征手法在作品中得到出色的展示,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边是岁月流逝、往事成昨的感慨,但一边却是时光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声音的历史、现在交织的回环往复的阅读效果。于是,在特殊境遇里展现的民族精神中那股勃勃生气和强悍精神在历史和现在的时态里纵横驰骋,撞击出郁结的情绪、深沉的思绪迸发的出口,作品便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评论家雷达曾对某些文学作品缺乏超越性和恣肆的想象力,总是热衷于摹写和再现的现象作过批评,说这些作品没有腾飞的提升。《红高粱》恰恰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出色,所以当年即得到他以及诸多评论家的青睐,浓墨重彩得以推举。仔细体味《红高粱》,会发现正是作家有意识把艺术的再现性和表现性和谐完美的结合赢得了多种口味读者的好评。

历史深处沉重的回音

——从叙述学角度再释《灵旗》

当代战争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成果极为夺目，以致当时有评论家由其中的表现预言，不久之后的战争题材小说界，将会有更具份量的长篇的大收成到来。时隔近二十年的今天，重读当时令文艺界又惊又喜的这些作品，依然能感受到那种震动的内力。中篇小说《灵旗》即是其中之一。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世界战争题材中短篇杰作群星灿烂的夜空，《灵旗》拥有属于它自己的位置。而《灵旗》的成功，得叙述策略之力甚多。此前的研究对该作品的叙述风格也给予了较多的注意，但就作品的整体研究状况而言，在把叙述策略与主题展现相结合考察的细致性方面，尚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因此，笔者以下将就此试作分析。

从凝固的创作框架里跳出——隐含作者控制功能的转变

中国新文学战争题材创作是在抗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在特殊的情况下，形成了特别的创作原则。为了战争的胜利，文学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思想深度、艺术技巧、审美功能等要素都必须服务于宣传这一客观标准。抗战胜利后，接着迎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别国对世界大战的感受，也不同于苏联卫国战争给人们的记忆。战争是残酷而令人痛苦的，但战争帮助中国人民完成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愿望。战时形成的创作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